

巩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巩县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封面题字.....	巩县第三中学校长刘成钧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焦瑞甫 (3)
巩县陶瓷厂的建立和发展.....	陈 迹 (5)
豫西抗日先遣队在小关的活动.....	张良贵口述、王振怀整理 (7)
琉璃庙沟歼敌记.....	马书庭 (11)
抗战时期倒地办法.....	路志宏 (12)
孝义兵工厂职工踊跃募捐支援抗日.....	孙一民 (14)
日寇飞机袭巩暴行记.....	刘庆昭 (15)
巩县的日伪组织简况.....	陈华策 (17)

巩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巩县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封面题字	巩县第三中学校长刘成钧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焦瑞甫 (3)
巩县陶瓷厂的建立和发展	陈 迹 (5)
豫西抗日先进队在小关的活动	张良贵口述、王振怀整理 (7)
琉璃庙沟歼敌记	马书庭 (11)
抗战时期倒地办法	路志宏 (12)
孝义兵工厂职工踊跃募捐支援抗日	孙一民 (14)
日寇飞机袭巩暴行记	刘庆昭 (15)
巩县的日伪组织简况	陈华策 (17)

回忆上日寇办的小学.....	焦水科 (21)
“同王殿”纪实.....	李 明 (23)

东庄镇民国年间的劳工组织情况.....	陈华策 (25)
回郭镇建国前的工商业.....	李秀歧 (26)
回郭镇的纺织业和卷烟业.....	李进永 (28)

刻碑匠作李彦星.....	王振怀 (29)
王敬芳先生生平简述.....	陈华策、岳志礼、白凤楼 (30)

如何评价邵鸿基 (续)

红枪会打邵鸿基.....	刘庆昭 (31)
邵鸿基知巩县事的片断.....	岳志礼 (32)

王升起义.....	王振怀 (33)
金牛山上举义旗.....	张桂星、张志交 (35)
孙十三起反.....	赵克治 (36)
在巩县进行的五次军阀战争.....	陈华策 (37)
巩县的会道门.....	陈华策 (39)
巩县的红枪会.....	赵克治 (41)
巩县的福音堂.....	杨景庆 (43)
建国前夕巩县人口统计表.....	杨景庆 (44)

巩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巩县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封面题字	巩县第三中学校长刘成钧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焦瑞甫 (3)
巩县陶瓷厂的建立和发展	陈 迹 (5)
豫西抗日先进队在小关的活动	张良贵口述、王振怀整理 (7)
琉璃庙沟歼敌记	马书庭 (11)
抗战时期倒地办法	路志宏 (12)
孝义兵工厂职工踊跃募捐支援抗日	孙一民 (14)
日寇飞机袭巩暴行记	刘庆昭 (15)
巩县的日伪组织简况	陈华策 (17)

回忆上日寇办的小学.....	焦水科 (21)
“同王殿”纪实.....	李 明 (23)

东庄镇民国年间的劳工组织情况.....	陈华策 (25)
回郭镇建国前的工商业.....	李秀歧 (26)
回郭镇的纺织业和卷烟业.....	李进永 (28)

刻碑匠作李彦星.....	王振怀 (29)
王敬芳先生生平简述.....	陈华策、岳志礼、白凤楼 (30)

如何评价邵鸿基 (续)

红枪会打邵鸿基.....	刘庆昭 (31)
邵鸿基知巩县事的片断.....	岳志礼 (32)

王升起义.....	王振怀 (33)
金牛山上举义旗.....	张桂星、张志交 (35)
孙十三起反.....	赵克治 (36)
在巩县进行的五次军阀战争.....	陈华策 (37)
巩县的会道门.....	陈华策 (39)
巩县的红枪会.....	赵克治 (41)
巩县的福音堂.....	杨景庆 (43)
建国前夕巩县人口统计表.....	杨景庆 (44)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焦 瑞 甫

我于1908年出生在巩县焦湾村的一个贫农家里。1924—1925年间，我在本村教书时，孝义大寨沟李保田送我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叫我读，从而接受了新思想。一九三八年，经人介绍到康店杨树沟小学任教。七月间，焦克复、徐宝森、王桂五等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39年，我先后在学生中发展了五个党员；接着，在农村进步青年中发展了康惠民（十年浩劫前任中央一机部第五局局长）、康清兆、李俊杰、于学通、康韦军（现在中央化工部基建局工作）等十九人为党员在坡沟建立了支部。五月间，又和焦弯、孝义等地的同志建立了总支。我任总支书记。九月间建立了区，我任区委组织委员，积极从事抗日工作。1940年底，地下党暂时停止活动以后，改由单线联系，我与徐宝森同志接头。后来，徐宝森离巩赴陕，通知我在家等候党的指示。我因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日、真投降而暴露了身份，处境十分危险。当我闻知教育科长齐子平与督学赵有光及国民党党棍刘博安要求逮捕我的消息，即离巩暂避。

1942年，巩县大饥荒。是时，我家儿哭妻怨，声声使人揪心。我坚持在巩未动，我相信党会有指示的。为生计，我白天到巩县、汜水交界处，掏尽力气，挣来一斤半斤玉米，晚上送回家中，和着树叶顾五口人的生命。后来，康店龙窝小学聘我任教，年薪两千元法币，当时小麦七百元一斗，明知一年劳动只能得麦三斗，也只得如此。可是，时隔不久，由于饥荒，学校停办，只好另谋生路。此时，老婆、孩子饿得皮包骨头，为了让孩子有个活命，与老婆商量把孩子送给人家，老婆不同意，只好向外人打饥荒，生活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得不顾老婆反对，把幼子丢到河里，把次子送给石灰务一家人家，余者由康维谦、康清兆接济，勉强维持生命，继续等候党的指示。

1943年六月底，徐宝森由陕回巩，让我去延安，给我了一千元的路费。我就带着大女儿淑音，同孟宪珽同志一起，以逃荒陕西为名，于1943年六月三十日动身赴革命圣地——延安。临行时，仅给家里留了十五斤玉米。

我们步行到洛阳后，嫌走得慢，拟乘火车，适票价涨了一倍，到西安时，只剩下五十块钱了。卖了简单的行装，又得五百五十元。钱少路遥，不敢住店，只得露宿车站。次日扒车至咸阳，与孟宪珽分手。此时，正值胡宗南匪部加紧包围延安，路上军警、特务多如牛毛。我一路装作河南难民，引着女儿沿村讨饭，闯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按照组织指示的路线，找到了焦家客店（店主系巩县人）。焦家客店在一座大山的下面，翻过这座山，就是国民党的最后一道关卡，过了这个关卡，再翻一座山，就到了陕北根据地了。因为这里是敌人的最后一道关卡，把守得很严，老百姓都说不好过去。恰好遇到洛阳一个在这一带当“郎中”卖药

的人，我们攀谈起来，他提醒我，在这一带卖丝线、纸烟的河南人很多，不妨装扮成做小买卖的人去试一试，并答应同我一起去闯闯。第二天，我以卖丝线、纸烟的身份与卖药郎中一起去闯卡子了。幸好那天把卡子的兵是河南口音，我便和他拉老乡关系，搬出是焦家客店（在当地有一定名气）的常客的招牌，蒙骗他们。郎中又是递烟，又是打恭。他们验明了我的路证，随手拿去五大包纸烟，才放我们过了卡子。一过卡子，便是大山，我以为到边区，心里松懈，脚放慢，郎中提醒我：离我要去的地方还有两天路程，尽是山路，还得小心。我提起精神，与郎中分手后，带着女儿进了大山。夜宿山里一老人处，承蒙盛情招待，初感边区人民之厚道。第三天到马兰，按照组织指示，去找河南省委王秘书。当时，有个姓王的同志接待我，说，河南省委已于二月间调延安学习去了，给我写了纸条，让我去延安找河南省委。一路上，虽然上山磨破了脚，下山摔伤了腿，还得背着女儿，但心情很愉快。终于在1943年七月十七日到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革命的摇篮延安。

到延安的第二天，“兵站”接待了我，休息了两天，“兵站”一同志让我写个自传，十九日就送我至中央组织部。当天夜里，一个同志找我谈话，误把我当作特务，投入了监狱。初时，我感到十分委屈：千里迢迢，受尽各种艰难，到延安是来革命的，而今却落个这样，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经过二十多天的思想斗争，才明白过来：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不断派遣特务窜入延安进行破坏、边区政府必须防范，加之河南各县党组织被破坏严重，但我相信组织是会搞清楚的。因而，耐心地接受了党组织对自己的审查。思想明白了，态度就积极了，每天除了捻毛线之外，还要学习。到1944年三月，我被释放，才知道这里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我正赶上当时的“抢救运动”而入狱的。我暂留保安处等候组织结论。闲着无事，自己就找事情做，学会了纺线、烧石灰。七月间，组织通知我到延安边区小学接回女儿。十一月间，组织给我作出结论，结论是焦瑞甫同志在政治上毫无问题，在地方上有群众，有威望，有信仰，是一个革命的好同志。当时，让我到延安市委去作组织委员，我怕工作不好，难担此重任。后来，组织安排我在延安保卫处当管理员。1945年日本投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曾积极参加修飞机场劳动。毛主席上重庆，我曾到机场上欢送；毛主席从重庆回来，我曾到机场上迎接，这是我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1945年十月，我和大批干部，从延安出发，步行两个多月，爬山涉水五千多里，到达河北省武安县柏延村中央局所在地。未几调到第二野战军大军区司令部参谋部情报处工作（团级待遇）。1946年三月，参谋长李达同志派我到郑州至洛阳铁路线建立军事情报网，了解敌军动向，随时用密电报告。八月中央局分配我到太岳区党委工作。区党委城工部于1947年四月又派我到河南偃师、洛阳一带工作，和南京阳翰笙接头联系工作（当时阳任河南省驻南京办事处处长）。1947年八月，我和一部分同志随陈谢大军渡过黄河，解放了豫西十一个县，我当时任地委总务科长。后经李仲民同志几次到地委要求我到浍池开辟工作。我和一个同志到樊亳二区，我任政委兼区长、队长。1948年五月，调偃师县委任秘书。郑州解放后，我又奉命带了二十个干部支援新区，省委调我到郑县任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只有我和陈冰之二人）。1948年十月，我要求回巩工作，经地委允许转回巩县。1949年元月任孝义区政委兼区长。1950年三月到省委党校学习，结业后，于1956年五月调开封县统战部任副部长。后得食道癌，在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住院。1957年三月苏联专家亲自给我动了手术。1958年八月退

休回巩养病，病体后未敢懈怠。仍尽残年余力，积极为党工作。这是我数十年走过的革命道路，谨以奉告。

巩县陶瓷厂的建立和发展

陈 迹

一九五一年九月，巩县陶瓷实验厂诞生了。随着生产设备的改进，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日用陶瓷、建筑陶瓷，耐火材料等厂，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我县地方工业，社队企业的一支力量，支援了工农业建设，繁荣了城乡经济生活。

回忆1950年，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支援群众掀起的生产高潮及抗美援朝的胜利，党中央号召各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当时，群众刚刚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经过土改，虽有了饭吃，但其它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比如没有碗用，使用其它代用品又很不卫生，政策为了改善当时供应情况，决定从处理巩县纺纱厂设备中，抽出四千五百元（合中州币四千五百万元）作为建立陶瓷实验厂经费。经过对白河古窑址周围原料资源的了解，就在当地选好厂址，因陋就简的筹建起来。资金大体分配是：一千元购置设备，修理地方，一千元建立烧窑，购买原料，一千元买煤炭，其它作为流动资金使用。筹建就绪后，又请几位技术工人，从九月实验开始，到十二月底就拿出一批产品供应市场。

第一批产品拿出来了，大家都受到鼓舞，有了信心，如何提高质量，如何把成本降下去，这是一个工厂能否存在的主要条件。提高质量，原料是根本。好原料什么样，好原料在那里，这对初担负这项工作的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认真学习了地质学、矿物学，实地采集各种矿石，通过对巩县山区的调查和多次试验，终于掌握了巩县各种陶瓷原料、耐火原料的矿点和质量，并能运用它烧出各种具有一定特色的陶瓷耐火材料。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另一项降低成本的措施。我国工业落后，当时陶瓷生产，使用的还是几百年来的原始工具，成型靠手工，干燥靠太阳。如果不改变生产方式，效率低、质量差的局面是不能扭转的。为了找出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办法，县领导支持我走出去，向先进地区学习，去开阔眼界。当时日记内记有：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

把厂内事情大体交待一下，早晨九点我就离开白河窑厂，向城内出发，一路上考虑，参观后回来如何发展我们的瓷厂。顺着白河向下，步步都能踏着古代的碎瓷片。这些瓷片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光洁。我们的祖先，给我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给我们创造了制瓷的方法。虽然这是一千多年前的事，这些遗物，还标明这里过去曾烧过很好的瓷器……，我们要踏着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前进，使祖国的宝藏能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这是我的希望，这鼓舞着我的

信心。我的心是冷不下去的，虽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经过到湖南参观后，大大的开阔了眼界。回厂后，就把我过去学到的修理机械技术，运用到改进生产设备上来。第一项是改革土式轮子，安装滚珠轴承，使轮子转动轻快平稳；第二项是制造两台小型电瓷成型机，投产后比原来手工生产提高二、三十倍；第三项是改进窑炉容量，经过几次改革，生产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陶瓷是一种易碎产品，使用的都是较重的矿及煤，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就需要靠近交通运输线。1954年五月，陶瓷实验厂由白冶河村搬到当时的县城站街车站，正式定名为“巩县陶瓷厂”。陶瓷生产迁到县城之后，就开始使用电力，粉碎使用了铁轮大碾，成型使用了电动轮子，质量产量都有相应的提高。

1958年，为支援钢铁生产，陶瓷厂改为生产耐火材料。当时职工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厂址发展为七万平方米。后来钢铁生产下马，生产耐火砖的职工也就复员回农村生产。这样给巩县布下了生产耐火砖的种子，为后来发展五十余家社队耐火厂奠定了基础。

1961年取消食堂，群众恢复按户各自为炊，市场上碗的供应非常紧张。为了短时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对陶瓷生产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原料加工，使用了电动和泥机，球磨机；成型使用了机器轮、石膏模；在不足两年内就解决了本地和外地用碗。并在巩县缺吃的灾情时期，用碗给巩县换回了粮食，解决了不少群众生活问题。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群众购买力还很低，发展起来的陶瓷生产，很快就出现了积压。为了使生产发展下去，单纯着眼国内市场是没有多大出路的，通过了解，广州出口交易会，有外商要求中国供应陶瓷产品。在1964年提出生产精陶的计划，这项计划被省批准了。中南区三委看到计划后，特派人到厂了解情况，认为有条件生产出口产品，批给试验费五万元，作为中南重点科研项目。经一年多的试验在1965年七月进行全面技术鉴定，批准投产，当年出口五万件。1966年出口五十万件。1967年上升为一百万件。产品质量较高，检验合格，受到广州口岸免验优待。为了扩大生产，在十年浩劫，城市停产期间，购进一批陶瓷专业机械设备，使精陶生产迅速发展起来。精陶出口在巩县定点后，在十余年生产中，产品产量比原来提高十倍以上。上缴利润达到整个固定资产的五倍多，每个职工每年上缴等于本人工资的两倍以上。

陶瓷厂在1965年以来除精陶迅速发展外，在1972年还分出一个电瓷厂。1966年试验建筑卫生瓷制造工艺，当年就扶持了四家社队企业。近几年卫生瓷销售量大，巩县已发展到八家，基本上已经成为我县的一种长久性的行业。

近几年除了维持正常生产工艺技术外，增设了煤气发生站。在国内本行业较早使用气体烧隧道窑。是一项较大的改革，使用气体燃料使陶瓷工业向自动化迈进了一步。在陶瓷品种方面，过去只生产一种日用瓷，今后将向多种方面发展。我相信陶瓷生产是有很大的生命力的，从原始社会人类定居之后，陶瓷就同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将来的应用会更加广泛。我们巩县又有丰富的陶瓷原料，陶瓷工业的发展有其辉煌的前景。

豫西抗日先遣队在小关的活动

张良贵口述 王振怀整理

一、秘密建立抗日组织

1944年秋天，皮定均同志率领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到我们这里，组织和领导抗日活动。在“先遣支队”到来之前，我党就派来了地下工作者，从事秘密联络工作。最早派来的同志叫孙克明，他1944年三月第一次到我家。（我和他相识是在抗战前期，当时他是原国民党三十八军赵寿山下边的一个副连长。抗战前，三十八军在佛山驻扎时，我是崇仁乡口头的保队副。）他在我家住了三天，向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我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我表示愿意参加抗日。并向他介绍了我们崇仁乡的政权情况和群众觉悟程度。1944年五月，孙克明同志第二次来到我家，这一次他来了十天，主要向我布置秘密发展抗日积极分子，进行抗日活动的任务。接着苑春芳同志来了。到了九月，范惠同志也来了。他们到来之后，就进入秘密串连，组织抗日积极分子的阶段。

最先参加抗日的积极分子有余学明、程子义、赵寿山、张荣军、王电英和我，由范惠、苑春芳、孙克明同志直接领导开展工作。活动地点主要在我家邻里的关爷院窑洞内。在以后较紧张的半公开时期，我们的活动地点不断变化，这些骨干分子的家里都去过，后来还到过我亲戚家，不断转移活动地点。

二、扩大组织，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为了进一步打开抗日局面，经过一段努力，抗日积极分子已发展到近二十个人，组织扩大后，我们立即进行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抗粮截粮。

1944年八月，我们了解到日伪县政府征派崇仁乡五十多万斤粮食的情况，立即组织抗粮截粮。当时征派粮食，是按银子征收的，每一两银子交粮五斤，全崇仁乡一千多两银子，共交粮五十多万斤。

怎样截粮？我们只有程子义的一支缺（que）把枪，六十五发子弹，我们自己制了一些假枪，分头到茶庵、项岭、梧桐河等主要大道截粮，我们每天天不亮守住路口，运粮队一到就立即截住，不准给日伪政府送去，不回去者一律没收。同时，我们又秘密串连各保，不准给日伪政府送粮，结果，原来摊派的五十多万斤粮食一点也没送到伪县政府所在地——站街。

2. 破坏敌人交通线。

主要是割敌人的电话线，当时，日伪的电话线是由汜水、荥阳到巩县城，中间经过老犍脊、官殿（今沙峪沟公社）。我们一二十个人，每天夜间出发，到官殿、老犍脊等地去割电线，天明回来。皮部到来后，我们把割来的电话线全部送到部队供给处。

3、借枪

为了取得武器，成立区干队，我们决定通过自己的人员程子义，向一个叫张云路的维持会大队长“借枪”。那天，我们几个人一齐出动，我和孙克明把住区公所大门，余学明手握两颗手榴弹把守房顶，程子义进门找张云路“借枪”。程子义向张云路说，想借一个班的枪去办一件案子，用后即还。张云路和张宝臣商量后，答应了，当即点了一个班的名，把枪借给了我们。我们就用这些武器武装了区干队。这次借枪，也是通过内线孙申和张让事先通知我们，知道维持会人少时才去的。

三、建立抗日地方政权——第一区政府

“借枪”不久，国民党县长姚云亭亲自到小关南寨召开军事会议，整顿地方武装。姚云亭到后，孙申同志又和我们联系，讲了情况，说姚要开会。于是我们也秘密参加了他召开的会。这次会，崇仁乡二十个保长都参加了，一些大绅士（如张诰）也参加了。孙克明、赵寿山和余学明三同志暗地参加了会议。孙克明化妆进入会场，赵寿山和余学明都是十七八岁，他们两人在外边以下棋为掩护。那天下午，姚云亭在大会上说：“今天的会议是整顿军事，最近从黄河沿上过来了一支番号不明的部队，可能是八路军，我们地方上也有共产党活动，如小关维持会就有一个班的枪被共产党夺走。为了加强防务，防共防匪，我们要把崇仁乡二十个保的枪支组织起来，武装好六个大队，配合县主力部队消灭八路军。”姚云亭当即委派了六个大队长，他们是：冯德光、张全光、程老五、马子仁、赵培堂、张五村。这六个大队长全是地方绅士。姚云亭命令六个大队三天内组织好，配合县上三个主力团，集中消灭已过河的八路军。

姚云亭召开会议之后，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一面继续侦察了解会后敌人的活动情况，一面由我和余学明去涉村向范专员和苑政委汇报。那天半夜出发，我和余学明经获坡、洪河、盘龙尖、天亮前赶到了涉村，见到了范专员和苑政委。汇报后，范专员、苑政委找了几个同志研究后，决定公开成立第一区区政府，针锋相对和他们开展斗争，并决心把二十个保的一千支枪夺到手，扩大区干队。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个同范专员、苑政委及皮定均派的一个王特派员和一个通信员等共九个人，从涉村出发，来到茶店西河筹备建立第一区政府的事，当天晚上开预备会，参加的人除了范专员、苑政委、王特派员外，还有一个李司令（支队长）——李天义和八路军四个干部，地方上我们二十几个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区政府人选。决定区长由孙克明担任，副区长由余学明担任，军事大队长由我担任，财粮助理余学明兼，民政助理程子义。最后征求意见时，我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曾先和苑政委交谈过，征得了他的同意。）我说，孙克明同志是陕西人，当区长“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当军事大队长也不妥，因为年轻（二十二岁），不懂军事。我们不如暂时利用原崇仁乡士绅乡政人员，让他们当有名无权的区干部，更有利于我们打开工作局面。特别是我们成立区政府后要夺取敌人的一千支枪，不利用他们肯定要打仗，不免带来牺牲。利用他们就可以不动刀枪接收过来。大家一致认为我这个意见好，就任命曾两次干过崇仁乡长的程玉茹当区长，由曾干过区公所民政干事的马新泰当军事大队长，原来人选改任副职。

西河预备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即1944年九月底，巩县抗日第一区区政府，在新中茶店莲

花院公开成立了。成立大会除贫苦农民参加外，参加过姚云亭会议的人员也全部通知参加。在区政府成立大会上，苑政委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八路军来到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救国，减轻人民负担的。可是有些人却搞反动宣传，说八路军实行‘共产共妻’，这完全是反动谣言。”接着宣布了区政府干部名单，要求姚云亭任命的六个大队长第二天把全部人员带到茶店莲花院，由张良贵检阅，统一指挥抗日。马新泰也做了补充。这样一来，姚云亭费心组织的六个大队，一千支枪全部被我们接收了。

接收后不久，这六个大队活动到亚沟一带，因我主力未到，又转移到玻璃庙沟，在张家祠堂整编为第一区干队。新整编的区干队，由十个中队组成，即包括接收过来的六个大队和我们的三个中队，还新成立了第十中队，主要负责通讯联络工作。我任区干队长兼军事助理员。

这是皮部到乳后成立的第一个区政府，推动了我地区抗日活动，为皮部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四、皮部到后的经济改革

1、减租减息，废除杂税

减租减息，实际是全部免租免息，皮部来后再也没交过地租和借息，就连乡公所派下来的杂税也基本免交，各保也不敢再收杂税，否则农会到区政府告他们的状。

2、成立农会，开展倒地活动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遭年馐，贫苦农民没饭吃，把土地都低价卖给了大财主。皮部到来后，首先建立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会，开展“倒地”运动。这个运动开展得扎扎实实，基本上把土地全部退还给了农民。在方法上，一方面动员地主主动退还；另一方面强令退还，如不照办就没收。“倒地”运动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好处。

五、开展武装斗争

第一区区政府成立后，我们有了政权与武装，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首先到大新（大峪沟，新山）开辟新区。接着建了第五区和第六区，这样以来，敌我双方不断发生战斗。较大的战斗有：

1，打佛山。姚云亭派三个团从县城来打佛山。我们区干队第六大队张五村驻守在这里，六大队分队长谷执和他的哥哥，与姚云亭的一个团长李夺甫有联系，李夺甫手下的一个人事先向谷执透露了敌人三个团来打佛山的情况，谷执向我汇报后，我们先让谷执在佛山抵抗敌人，一面调派六个大队从获坡出发抄敌人的后路。谷执和六个中队两头合击，敌人撤退。我们在王河打死敌人十几名，俘虏五名。但谷执同志阵亡了。

2，打高山。我和孙克明到汜水岳顶开辟根据地。汜水自卫团一个中队长王乐山驻守高山，我和付东山同志先侦察了敌情，了解了地理情况，然后带领六个中队去打高山。我们从高山北面抄后路，天亮前包围了敌人。战斗一打响，敌人发觉已被围困，仓皇逃跑，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打死敌人两名，俘虏两名，打伤几人，而我们自己无一损失，高山据点拿下后，我们就在汜水岳顶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岳顶区政府。

攻打高山后，我和马新泰又指挥部队打垮了汜水自卫团方子美驻守在五云山的一个排，占领了五云山。

3，打水头皇姑寨。岳苟头部驻水头皇姑寨，我们打了几次未打下。我们兵多了，敌人

跑掉，我们人少了，敌人抵抗。后来皮部派来一个牛政委协同指挥。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用小孩棉鞋套在马蹄子上。经过皇姑寨后，我们就到处游动，直到须水一带。一夜转移五六个地方，给敌造成处处是八路军的印象。后来，从须水南边向岳苟头靠近。我们发现敌人有许多机枪架在地上，而我们自己只有一挺机枪。牛政委派人与岳联系，声称我们是打日本鬼子路过此地，下午就开拔。敌人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傍晚时我们佯装开走，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皇姑寨，趁敌不备，突然奇袭，端了敌人的窝。

4，琉璃庙沟。打了皇姑寨以后，方子美、王乐山、岳苟头对八路军怀恨在心，要报复我们。于是，他们联合日本鬼子决心与我们决一雌雄，狂言要端八路军的老窝。1945年农历五月初十，敌获悉我十个中队集结琉璃庙沟的消息，妄图围剿我们。于是蒙阳伪自卫团、汜水伪自卫团和日本鬼子二千多人向琉璃庙沟偷袭。天亮前赶到后，我军正在出操，便突然袭击起来。我们也迅速应战。战斗打响不久，我正规军突然从山上冲下来，和区干队十个中队两头合击，敌人猝不及防，阵脚大乱。这时，我和皮部老四连联系，由我带领一个班到小里河排枪迷惑敌人，敌人听到枪声后果然撤退，我军乘胜追击，又消灭了不少敌人。这次战斗，我正规军起了巨大作用，这是敌人没有料到的，原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正规军回来，认为只有区干队。而我们的正规军是新从登封、偃师回来，和地方武装会师联欢的，正好赶上打了这一仗。琉璃庙沟这一战，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我亲眼见到打死十一个日本兵，伪自卫团被消灭一百二十名左右。另外，还打死一个伪自卫团长，连尸体也没有找回。战后不久，敌人纠集了更多的兵力来报复，由于我们区干队和老百姓全部撤到山上，敌人扑了个空，只得拖着第一次被打死的日本兵尸体，退了回去。

还有许多次小规模战斗，不再赘述。

六，处决反革命，准备南下。

到1945年八月，皮部南下前夕，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反动绅士和汉奸的情况，如米河第四中队一个指导员曾被暗杀；敌人打琉璃庙沟就是有汉奸向敌人通信。经过一段调查了解，充分掌握了他们的罪证，罪大恶极的，必须严惩。事先通知这些反动分子，说是去涉村召开秘密会议，等他们到了涉村后立即逮捕，宣判死刑，就地枪决。第二天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当时处决的有十几个人，如马子仁、程老五、马光五、马新泰、马明远、郑作奇、张绍臣、赵左克、曹培仁等。处决反革命，为广大群众出了气，除了祸根。

七，皮部南下的有关情况。

皮部南下是在1945年农历八月十五。这时地方武装已成为主力部队，区干队和县独立团都随老三团正规军南下。南下集结地点，开始在苇园、获坡、老庙山，后来主要在涉村、圣水一带，然后向南运动。

南下时，我正有病，范惠同志派一头骡子送我回家养病，所以部队南下以后的情况不清楚。我到家后三天，国民党王雨林清乡队就回来“清乡”，反攻倒算。在家躲藏半个月后，我远出在外，这里的情况也不知道了。

琉璃庙沟歼敌记

马 书 庭

1944年，日寇出动四五万兵力向河南进攻。当时驻守河南的胡宗南、汤恩伯等部的四十多万大兵，一枪不发，仓皇逃命。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豫西三十多县的广大地区便陷于敌手。中国共产党为拯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豫西人民，组成抗日先遣支队，由皮定均司令员率领，飞越黄河天险，直抵豫西敌后，痛歼日顽。

1944年底至1945年五月初，活跃在巩、汜、荥、密等县的先遣支队三团，先后重创了汉奸武装方子美、岳狗头、李中营、王乐山等部，引起日寇注意，于是驻在汜水城的日本鬼子倾巢出动，在巩、汜、荥几个县的伪军配合下，分兵三路，向三团驻地琉璃庙沟偷袭，希图报复。三团团长钟发生获悉后，当机立断，做了战斗部署。三团主力留驻琉璃庙沟诱敌。专署机关和团部转移到距琉璃庙沟三里多的茶店，三团其余部队和县独立团部，分别进入有利战略位置，和控制制高点，对琉璃庙沟形成马蹄包围。同时，我们增设了副哨和流动哨，及时掌握敌情，一旦敌人进入包围圈便聚而歼之。天黑前，一切布置就绪，万事皆齐备，单等鬼子来。

天黑了。夜幕笼罩了大地，千山万壑，一片沉静。经过一天的战斗准备，战士们擦好了枪，上好了子弹，系好了鞋带。我们卫生队的战士，撕好了绷带，准备好了夹板。担架排的战士也把担架整理停当，全部进入阵地，等待着敌人的来袭。

然而，到将近五点钟，还没有发现敌人的动静。我们卫生队的几个同志认为天已破晓，鬼子不会来了。几个人就到河边去洗脸。刚到河边，突然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紧接着就是鬼子的小炮弹的爆炸声。

果不出所料，鬼子偷偷地包围了琉璃庙沟，用两挺机枪和一门小炮对准三团团部和专署住的窑洞，猛烈射击，我们听到枪炮声，立即跑回驻地，带上武器、弹药和救护器材，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被分配到团指挥所，跟随钟团长，担任救护工作。当我随着团长到达琉璃庙沟和茶店之间的无名高地时，我团各连战士正向鬼子展开猛烈的攻击。三连已抢先占领了琉璃庙沟的沟北口，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四连由南山梁向北压，六连和团直，从敌人正面向西边冲。只见全体指战员如同猛虎扑向敌人，枪声、炮声、杀声，暴风雨般地震荡在山谷之中。猝不及防的敌人，乱做一团，一具具尸体，狼籍山谷。鬼子用机枪也阻止不住伪军的逃窜。不久，只剩下两个中队的鬼子了。这时，县独立团追歼伪军，三团全部兵力对付日寇，以便聚而歼之。

鬼子都具有武士道精神，他们一个个端着刺刀向我反扑，作垂死挣扎。但一次次都被密

集的火力压回。经过几个回合，鬼子又死伤过半，日寇大队长像发了疯一样，嚎叫着，挥动着指挥刀冲出指挥所——小山神庙。指挥残部集中向六连阵地反扑，把手榴弹扔向我团指挥所和六连阵地，但在手榴弹爆炸前的一刹那间，都被我战士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粪又一个一个铲起投回敌阵地。我团的宣教股长张开政同志风趣地说：“这叫有来无往非礼也。”说得战士们哈哈大笑。为了击退敌人的反扑，钟团长命令枪炮连于连长亲自炮击敌指挥所。于连长有过硬的迫击炮射击本领，远程百发百中，近程能一墙之隔发屈射。于连长按照钟团长的命令，快速校了一下炮位，开始射击，一发发炮弹，准确地命中敌群；随着一声声的轰鸣，敌人血肉横飞，日本联队指挥官也当即被炸死。失掉指挥的日军乱做一团，四处奔逃，他们的炮兵连炮架、炮座都来不及带，只扛个炮筒便跑了。此时，我军发起冲锋，双方展开肉搏。日军残兵及乎全被击毙。战斗刚一结束，当地群众抬着茶水、拿着鸡蛋，到战地慰问战士。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时，米河方向跑来一个老乡，告诉说，离此六七里地的村子里逃出的鬼子正在烧水喝。我军闻讯后，立即派兵追击，包抄，敌人又丢了几具尸体。所剩无几的日本鬼子侥幸逃回汜水城。从此以后，鬼子再也不敢侵犯我根据地。这次战斗从早上五点一直战斗到下午一点多，在巩县人民的支持下，共击毙伪军一千多人，二个中队的鬼子，除几个逃回外，其余全被消灭。琉璃庙沟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豫西人民的抗日斗志。

抗战时期倒地办法

路志宏

说明：皮（定均）徐（子荣）抗日先遣支队进入豫西，建立起抗日政权后，为解群众于困顿，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抗日政府颁布了“土地转移办法”，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倒地”运动。各地“倒地”委员会相继成立。

堤东系巩县南部的一个大村，“倒地”工作分两个点进行、点下分片，设有调解组，调解时卖户说明卖地时间及情况，先由小组调解，若调解不了，由调解组介绍到倒地委员会，到点上处理。办法是通知买卖双方到场，先讲明政策，对照条件，合理调解，当面协商，如协商不成，评议员评议，干部决定，卖主当场交钱，买主当场交契约。买主不通，又系真正贫穷而不如卖主者，或有特殊原因，准许上诉。买主若是土豪、劣绅，大富户，强行交出土地，不准上诉。

当时巩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土地转移办法”，我抄有一份，保留至今。

路志宏 1983年4月20日于党史办

抗战时期倒地办法

（一）本办法依据前颁之河南省被灾时期地权处理办法，参照本区实地情形，提高生产增进抗战办补充之。

（二）自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一日（阴历六月一日）起至三十二年九月底（阴历九月二

日)止为灾期。

(三)在被灾期出卖之土地,准由原业主于民国三十四年底,随时得以下列情况处理之。

- a、确因灾荒所迫买主又系富有,此准原价买回;
- b、非因灾荒所致,买主如不系富有者,不准买回;
- c、买主双方均系富有者,或均非富有者,可以酌予加价或退土地一部,但最高额不能超过原地现值之一半。

(四)在被灾期出典之土地,无论其原定契约有无期限之规定,均由原业主于民国三十四年底,随时原价不计利息赎回之。

(五)在被灾期换买土地,依照原换卖之手续,参酌第三条之规定,准予互相换回。

(六)在被灾期出卖出典之土地,中间经过复价,不论契约有无改变,均以原出卖出典之时期为主,适用第三条及第四条之规定处理之。

(七)出卖出典之土地,如经转卖转于他人者,均向原买主次第买回或赎回之。

(八)买主串通来人,私自修改原契,企图狡赖,除查明实情,履行本办法之规定外,得处于原地价三分之一之罚金。

(九)买卖土地如有增益(地面建筑修补等),原业主买回时,酌予增加。作其价,依据增益时之价格评定之。如天然损益者,不予赔赏。如买主故意损益,其土地或地面之附着物由买主酌予赔赏,情节重大者,得以原地价之三分之一作罚金。

(十)买回赎回之价格,应依据契约所载之货币。数量,依现时流通之货币,交付之。买赎如系实物,得以原买时之市价,折合交付之。

(十一)原业主之直系家属,未经析居者,无论原契如在之名称属谁,均可依法买回或赎回,其已经析居者,原业主现时均行出外,又无适当证明受原业主之委托,概不准代理买回或赎回。

(十二)买回赎回之土地,应将原定契约官契执照,一律经抗日县政府注销后,退还原业主。如契约遗失,经四邻、村、闾长证明,得立失约证。如故意抗不交割,谎报遗失者,除追回原约外,得处以原地价二分之一作罚金。

(十三)以上各项罚金统交抗日巩县民主政府作行政收入。

编者按:此件系原堤东抗日农民救国会副主席路志宏同志保存。他是堤东1944年冬至1945年春领导倒地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因此件辗转抄录,可能会有错误或遗漏之处,如果引用,请慎重处之。

孝义兵工厂职工踊跃募捐支援抗日

孙 一 民

1936年冬的绥远百灵庙大捷，收复了百灵庙，轰动全国，这是继1932年长城之战后又一次驰名中外的重要战役。

百灵庙战役（当时人们叫“绥远战役”）是付作义将军统率所部，并为将军亲自指挥。以奇兵制胜，全歼入侵百灵庙的日寇，斩断伸入绥远北部边疆的魔爪，打破日寇妄想轻取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威胁大同，控制雁门关迤北之线的我大片土地的梦想。

当绥远前线捷报在南京中央电台广播和在报纸上发表以后，我所在的兵工厂——孝义兵工厂，工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群情激动，无限欢腾。记得在当天上班时，大家三五成群在机器之旁，议论纷纷，有的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说，眉飞色舞，夸耀前方将士之机勇；有的昂首恭听，喜形于色。那种舒气和高兴的场面，是从未有过的。这与往日说起鬼子如何蹂躏东北同胞时所表现的颓丧气氛大不相同。从沈阳兵工厂流浪到这个厂的工人师傅们，显得分外兴奋。他们亲身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亲眼看到不战而失去了东北广大土地，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要在平日谈起鬼子，既咬牙切齿，表示愤慨，又唉声叹气，泪珠盈眶。但在这天，他们都一反常态，显得格外激动，两眸迸发着希望之光，似乎东北失地可旦夕收复，他们指日即可到那大豆、高粱遍地的家乡。整个车间的三百多名工人完全沉醉于兴奋激动的海洋之中，整个机房沸腾了。管开关电机的一位老工人竟然忘记了开车，更没人来提醒他。按厂方规定，到点不开车是要罚工资或被开除的，这天谁也不在乎这个罚规了。

听说绥远前线气候十分寒冷，将士们身穿单衣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前线将士打鬼子，杀敌人，为中国人民争气，我们应该慰劳他们。咱们捐款吧！”不知是谁陡然说了出来。话音刚落，有位工人师傅伸手从工具箱内取出带有油污的纸张，订了个不太整齐的本子，大家就在这个本子上签名，并写下捐款数目。自发捐献活动在车间踊跃开始了。有捐一天工资的，有捐三天的，也有捐十天或一个月的。当时徒工工资不过六块钱，勤杂工和熟练工的工资也仅仅是八九元到十五元左右。但他们慷慨捐献，毫无吝色。我和二哥各捐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哥是工匠，月工资十八元，我是徒工，工资六元。记得有位姓王的车工师傅，他在“九一八”事变后逃出沈阳，流浪到我们这个兵工厂来做工，当时正患肺结核病，买药没钱，生活也困难，但还是捐了一个月的工资，约三十多元。我们车间的二百多名工人，没有一个不捐献的，据说全兵工厂一万多名职工，人人都捐献了，虽数目多少不一，但不捐献的是没有的。

捐献活动完全是工人自发的爱国行动。这种自发的爱国活动，同时在全国各阶层也轰轰烈烈地展开，声势之大，捐献之踊跃，可谓空前。